



Canadian TCSL Association  
加 拿 大 中 文 教 学 学 会

The 6<sup>th</sup> Canada-China TCSL Conference  
Collection of Papers

3.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方言偏误及预应理论试说——以四川方言为中心**  
**A Study of Dialectal Error and its Prevention Theory in TCFL**

汪启明教授, 中国西南交通大学

**摘要:** 对外汉语教学已经成为国内外一门显学,但目前各种类型的教学组织都没有将汉语方言考虑进教学内容,也没有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更谈不上方言偏误的分析。任何语言都包括标准语和方言,二者相互依存,对立统一。掌握任何一门语言均不可偏废方言,汉语也不例外。既要重视对外汉语标准语教学,也要重视对外汉语方言教学。运用偏误理论将标准语的消错和方言的消错置于同等级地位。偏误理论是一种事后的管辖,应该在对外汉语方言教学过程开始时就预见偏误点,提出相应的消错策略。预应理论的核心是由普到方,找出对应规律,为高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方言教学奠定基础。

**关键词:** 对外汉语方言教学 偏误 预应理论

### 1.0 方言与对外汉语教学

1.1 我国正在全力推行普通话,要求学校教师、公务员都必须讲普通话,在公共场合,人人都提倡讲普通话,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以普通话为主,这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语言都包括方言和标准语,标准语不过是一种势力较大的方言。各种语言都由它的方言组成,

学习任何语言，也都应该标准语和方言并重，因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以交际的基本工具是方言。汉语本身亦包括普通话和方言，没有方言就不成其为汉语。根据赵春利（2005）的综述，结合最近几年偏误研究的情况，我们至今还没有见到以方言为对外汉语教学内容的偏误分析成果。<sup>1</sup>这说明，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方言的教学及其研究还是一个空白点，更谈不上偏误研究了。

1.2 标准语和方言的互相依存肇自远古。验以文献，论及雅言，有孔子所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尔》）；论及方言，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有各诸侯国“言语异声”（许慎《说文解字·序》），有“夫九州岛岛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也”（《颜氏家训·音辞》）。这些论述是说，古代华夏民族语言有雅言和方言之分。在教学、重要交际场合或举行正式仪式时都用雅言；但雅言并不排斥，也不能消灭方言。秦始皇可以统一文字，但却对方言无能为力。方言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客观现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1.3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雅言的标准有所不同。不同的方言曾在不同的时期里成为标准语（或官话）。古代的“通语”“雅言”、“夏言”、“天下通语”、“官话”等，并不是某种方言的特权，其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也只是使用人口较多的北方方言，而且内部也存在着较大分歧。今天汉语的面貌，是历史上汉语不断地融合与分化，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语言成分积淀而成。过去的通语，今天可能是方言；而过去的此地方言，今天也可能是彼地方言。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古时候的一个音在甲方言发生了变化，在乙方言却保留下来了。汉语的历史和现状都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对外汉语教学中不能回避方言，但因为汉语方言教学的师资、教材、大纲等诸多原因，方言其在对外汉语教学内容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6 “方言”的概念是变化的<sup>2</sup>。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即方

言。这是因为，没有离开具体方言的语言。这样的观点，赵元任先生早就正确地指出过：“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sup>3</sup>胡适说：“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做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sup>4</sup>沈兼士先生早年着力批评过把汉语看成大一统的偏见：“盖诸家之所谓古者，统三代秦汉之总称：或以三百篇为本，等而下之，摄及秦汉音，无不同也；或以《广韵》二百六韵为本，等而上之，摄及三代音，无不同也。虽其考订排比，部类秩如，要皆以一地概四方，以一时概千古，汗漫支离之病又焉能免？”<sup>5</sup>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方言是相对于标准语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方言也就无所谓标准语。标准语是以该民族所使用的某一种方言为基础，以某一个地域方言的语音为标准音的。从语言材料来看，方言和标准语、方言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来概括。历代文人之作仍然存在方言现象，即便魏晋南北朝文人所撰最具代表性的描写性音韵著作《切韵》，尽管人们对其性质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是某种方言的记录<sup>6</sup>

1.7 对外汉语应该将方言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目的的必然要求。早在1986年，王文虎先生就指出：“外国学生要学习普通话，掌握规范化的标准语，这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同时，也应该看到，确有一部分学生，对方言学习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有的要同操某种方言的中国人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上的交往；有的要在中国继续深造，却苦于听不懂老师的方言，直接影响了

专业学习。出于交际的需要、继续学习的需要，外国学生迫切要求听携带方音的普通话，懂得一些方言。为了满足这部分学生的要求，教材中存在方言成分也就是必要的”“一股地说，来四川学习的外国学生，要求对四川的情况多了解一些，要求学习四川有而外地没有的东西，部分学生要较长时间在四川学习和生活，要求学一点日常的活的四川方言，以应付学习和交际的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可以不教汉语方言。“学生进入三、四年级，基础汉语的学习阶段基本结束，可以根据需要有选择地逐步地加入一些方言材料，比如有注释的方言文学作品阅读，带方言词语的中级口语等。这可以说是第二个层次。对于高年级学生，或者以专攻某地方言为目的的、普通话水平较高的学生，可以编写出适合于他们学习的方言教材。如普通话与方言对比的口语教材，方言文学作品选，以其一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方言学，方言专题研究等。这可以说是第三个层次。”<sup>7</sup>

**1.8** 对外汉语教学中讲授和学习方言难度很大，对教师的要求也非常高。汉语学习不达到一定程度，会呈现系统性偏误。因为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还是在语用方面，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与内容。不仅留学生，即便其它方言区的对外汉语教师也难以掌握。但当地人们在交际中却大量地使用方言。例如，操四川话中国人目前约有1亿3千万，与四川话相近的是西南官话，这包括广西的部分、湖北的部分甚至也包括陕西的一部分。如果要在这么大的区域里与人接触和交际，不了解这个地区的方言，就会遇到相当多的交际障碍。其它南方方言如湘、闽、浙、赣、粤等更是与普通话分歧巨大。学生如果仅仅学习了普通话，要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实现顺畅的交际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将普通话和方言作为他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我们认为，没有对于汉语方言的学习与运用，这样的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当然，不应该一开始，而应该在高级阶段才加入方言教学内容。如果说，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掌握标准的普通话，那末对外汉语方言的教学目的当

---

然是掌握纯正的某地方言。应该说明的是，现在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还没有系统地对外国留学生讲解汉语方言的教材和课程内容。方言偏误是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体系的盲点而非一词一句的偏误。本文着重论证在对外汉语方言教学中的偏误预应策略。

## 2.0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偏误理论及预应策略

2.1 非汉语国家的学生学习汉语，是第二语言学习。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早期的错误分析主要是将常见错误搜集起来，从语言结构的角度进行归纳分类。其目的主要是方便教学项目的安排或为课程的补习提供依据，它没有任何的理论框架，也不解释错误在第二语言获得中究竟有何作用。因此，人们对错误既没有给予严格的定义，也没有从心理的角度来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理论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其来源，解释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从而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与规律。偏误分析的心理学基础是认知理论，语言学基础则是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被看成是规则形成的过程，即学习者不断从目的语的输入中尝试对目的语规则做出假设，并进行检验与修正，逐渐向目的语靠近并建构目的语的规则体系。

2.2 Corder 是现代意义上的错误分析的最早倡导者。1967年，他在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一文中，对“失误” (mistakes) 和“偏误” (errors) 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失误指在言语表达时，遇到特殊情况，比如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粗心或紧张等，偶然产生的瞬时语误或笔误，具有偶然性。这类错误与说话者的语言能力的强弱没有必然的联系，属于语言运用范畴，可以自己改正，以后也不一定会再犯。偏误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不自觉地对目的语的偏离，是以目的语为标准表现出来的呈规律性的错误或不完善之处。它反映了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准，不易改正，以后也很可能多次重复出现。其中，那些明显带有结构形式错误的句子属于显性偏误 (overt)，而语法看起来正

确，但在语义、语用等方而不正确的属于隐性(covert)偏误。<sup>8</sup>鲁健冀(1992)说：“学习外语的人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时，从整体上说，他所使用的形式与所学外语的标准形式之间总有一定的差距，这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如语音的、语法的、词汇的、篇章的、语用的。我们把这种差距叫做‘偏误’。‘偏误’与通常所说的‘错误’小同。错误是偶发的、无规律的，例如口误。人们说自己的母语的时候，也会发生错误而偏误则是学习外语的人才会有有的，是多发的、有规律的。学习外语的人只有经过反复纠正偏误，他所使用的外语才能逐步实现该语言的标准形式。”<sup>9</sup>一般认为，1984年，鲁健冀发表《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汉语偏误分析的研究报告。此后学者们对偏误分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sup>10</sup>。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季秀清、宋希仲《谈谈错误分析与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发表于1983年，指出错误分析局限于添加、选择、省略、次序几类，“过于简单、概括，只是从表面加以区分，没从根本上谈及原因”，也有人分为从母语造成和目的语的难点造成两类，“也似乎不完全”，较鲁说为早<sup>11</sup>。

2.3 偏误可从不同的角度分类。语言本身是一个层级系统，偏误可以发生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也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要素，例如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甚至语形等不同的方面的偏误来分类，还可以分为偶然偏误与习惯性偏误、语言要素偏误与非语言要素偏误、语言偏误(intralingual error)和语境偏误(interlingual error)，等等。

2.4 对外汉语教学的偏误现象，一般总结其原因为(1)母语的负迁移<sup>12</sup>；(2)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3)文化因素负迁移；(4)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5)学习环境的影响(主要指教师和教材)等五个方面。但是，仅仅谈到这些是

---

不够的。正如齐沪扬（2005）所指出的：“在实际中，偏误的产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影响偏误的五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时还同时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划分也还不甚科学，分类标准不统一，概念有所交叉。因此分析偏误的成因，并不是要生搬硬套上述了五个方面，而是要以这五个方面为参照，研究偏误产生的具体的思维心理过程，并在差异中求共性，探求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规律。”<sup>13</sup>

2.5 偏误具有相对性。在目前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所谓偏误，是假定教师操标准的普通话，要求学生也学习标准的普通话。但事实上，既不可能要求教师操标准的普通话，因此，学生所掌握的也不可能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即便是所谓标准的普通话，也仅仅是一种使用人数较多的方言而已。所以，普通话的偏误标准是相对的，而方言的偏误标准也应该是相对的。

2.6 目前已有的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更多地是强调偏误与消错。结合以上论述，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看法：仅仅靠教学过程中或教学过程后的纠偏是不够的。应该引出一个新的构想，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预应策略。通过对相关教学内容的研究和分析，辅以适当的实验，以教学对象的母语与汉语的比较为基础，在教学过程开始前就进行应对，从“纠偏”到“预偏”。这样，较之发生偏误之后再来进行纠正更有效，更能使学习者提前在教师的指导下实现“正迁移”。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除了解、熟悉、掌握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诸相关语言要素，而且应该了解汉语方言的学习、掌握及学习产生可能的偏误与预应策略。通过由普通话到方言的对应关系归纳，准确找出“普~方”差异，就能有效地预防对外汉语方言教学中的偏误问题。

下面我们就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以四川方言为中心，来讨论对外语教学中的方言偏误点及预应问题。应该指出，这些四川方言的语音词汇现象，不限于仅在四川，大部分西南官话区均存在，有些甚至与北方方言区或荆楚方言、秦晋方言相同。这也说明了方言同言线难以确指的方言分布现象。

### 3.0 汉语方音的偏误点举例及预应策略

3.1 声母的学习与偏误。汉语各方言虽然语音分歧相当大，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本结构一致。方言之间的语音分歧主要表现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数目和内容不同。<sup>14</sup>而以四川方言为中心的西南官话区与普通话相较，声母存在边音和鼻音、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双唇音和唇齿音三大主要问题<sup>15</sup>。

四川方言最突出的语音现象是[l]、[n]不分，如果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训练学生发音，只需要用“南[n]充的蓝[l]天”作为训练语句，发[n]时舌尖顶到牙齿发出，发[l]舌尖顶到上腭发出。如果韵母不是[i]开头(如[i]或者[in])，则[n]都通读为[l]。如“南方”，四川话中音同“兰方”。[n]在[i]前腭化为舌面鼻音，如“牛”、“年”、“娘”，而在开口呼前就相混，如“南”。“常”在在普通话中念舌尖音[tʂʰ]，而在四川话中则念[s]。中江等地区[f]-[h]分不清，普遍没有[h]声母，说普通话时把[h]读成[f]。古影母开口呼字，大多都冠以声母[ŋ]，如“安”[ŋan<sup>55</sup>]、“恩”[ŋən<sup>55</sup>]；古疑母字除合口一等、三等字以外皆保留声母[ŋ]，合口一等字声母[ŋ]消失，三等字大部分声母转为[n]、少部分字声母[ŋ]消失或者保留声母[ŋ]，介音消失。“阶”字在古代的声母是舌根音[k]，汉语普通话中已变为舌面音[tʂ]了，四川方言仍然念舌根音[k]。保留着洪音的读法。

3.2 韵母的学习与偏误。四川方言 [əŋ]与[ən]在大部分音节中通读为[ən]，如“痕”与“恒”同为[hən]；“棱”发为[lən]。相应地，[iŋ]与[in]发音相混，完全通读为[in]。但是只这样理解，又会发生偏误。因为[əŋ]和[ən]在声母[b]、[p]、[m]、[f]后能够区分，前者变为[uŋ]，而后者仍然发[ən]的音。**四川话**中没有韵母[e]，只有[ê]，故使用[e]代替[ê]。而且四川方言内部又有小的差异。虽然四川大部不能分卷舌音和平舌音，而成都市所辖彭州市、郫县、都江堰市和新都区西部使用一种独特的“卷舌音”，在读“十”、“室”、“吃”、



“侄”等古代入声字时不仅翘舌，而且舌尖后卷，有点类似于儿化音，比如“十”[shir<sup>21</sup>]、“吃”[chir<sup>21</sup>]。在四川部分方言中，“南”在“南方”中念[lan<sup>21</sup>]”，在“南瓜”中却又念[lan<sup>21</sup>]音，发音靠后。四川话中没有韵母[uo]，大部分读[o]，部分入声字为[ê]、[uê]。另外还有一个独特的韵[io]，读阳平时多为中古时期的入声字。

3.3 声调的学习与偏误。英语是一种主要依靠语调来区别句义的“语调语言”；而汉语则属于以声调区别意义的“声调语言”。应该知道，即便是在北方方言区，也不是所有的方言具有同样的声调。<sup>16</sup>这给对外汉语方言教学带来了极大困难。例如，四川话一般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古入声字绝大多数归入阳平调。4个声调的调值分别为55、21、53、213。而四川方言中的多音词“歪”，[uai<sup>55</sup>]既是“凶巴巴”的意思，如“歪人”“歪得不得了”“歪得很”，如果声调读[uai<sup>51</sup>]，则组词为“歪货”“歪书”“歪产品”，指假冒伪劣的意思。如果学习者不注意掌握声调的变化，就难以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四川方言中有一个词叫“跔”[tsuai<sup>51</sup>]，意思是身体摇摆，如“他脚后跟受了伤，走路～一～的”，李劫人《大波》：“三姨太太装着小脚走路的样子，忸忸怩怩～到路广钟跟前。”也表示较为抽象的得意、摆架子，如“他这个人有点～”，“他这个人～得很”；如果读成平声[tsuai<sup>55</sup>]，则指把一种没有人要的东西硬塞给别人。如“他硬要把一条烟～给我”，又是走路不小心跌到的意思，如“他～倒了”。又如“挝”[tsud<sup>21</sup>]，普通话这个音节没有这个声调，表示“踢”，如“～了两脚”，读[tsud<sup>51</sup>]时表示疑问词“干啥”。又“悟到”，读[ŋan<sup>21</sup>]，意思是“暗中猜到”；但如果读成[ŋan<sup>51</sup>]，则表示“藏到”“掖起”的意思。撑[ts<sup>h51</sup>]得很（不合作），撑头兵帮。可见，不能正确的掌握声调，是难以将方言的语音学习好的，也影响交际。

#### 4.0 汉语方言词汇的偏误点举例与预应策略

如果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词汇量掌握不足，在第二语言交际中，学习者就会采取造词、向已知词汇或者直接用母语借用等策略来达到交际的目的，可归入“沟

通策略”偏误。有的学习者只重视词语的概念意义和主要意义，而忽略了内涵义及次要意义，把目的语中熟知词汇的语用范围扩大化，在语义相似的场合均使用同一词语，造成了偏误。如果学习方言，偏误就更为显著。

#### 4.1 词义的确切性掌握。

4.1.1 如“跳”，是指离开地面，但是“跳河”“跳井”“跳岩”却又不尽方向向上。四川方言的有一个词叫“跳战”，意思是很活泼。而四川话“跳加官儿”，这个“跳”就与实际的跳没有多大的关系。实指为一种仪式，而虚化则形容某人像跳梁小丑，台前幕后活动。

4.1.2 方言有多义词。如四川话的“冲壳子”有两个意思。一是说的是假话，即撒谎。二是聊天，摆一些古旧的故事。比如四川人说：“你冲壳子的哦。”那就是他说你在撒谎。如果他说：“来，我们来冲壳子。”那就是摆故事或聊天的意思。

4.1.3 四川方言词语还有古汉语的存留。如“草”指雌性的(鸡、狗、马等家畜)。《尔雅·释兽》：“牝曰駘。”郭璞注：“牝为草马。”顾炎武于此有专门的宏文，以《北齐书》、《隋书》证六朝有此语<sup>17</sup>。又如“醪糟”一语见《说文》：“醪，汁滓酒也。”《唐韵》：“醪，鲁刀切，音劳。”今有“醪糟”，香甜醇厚，以糯米为原料，盖源自远古。又如“烧酒”，白居易有《荔枝楼对酒》诗“烧酒初开琥珀光”。

4.1.4 每个方言都有一些本方言独有的词或熟语，如四川方言把“干什么”叫作“做啥子”，另一个表述语言“咋子”[[tsud<sup>53</sup>tsi]，除表示做什么，用于问句时，也表示不耐烦的情绪；用于质问时，颇含有挑衅的意味。个别地方读为[tsA<sup>53</sup>tsi]，发音脱落了韵头。“结束”叫“煞各”，被人羞辱时的感觉叫“柳人巴沙的”。如果用书面语言表现出来后，别说外省人看不懂，四川人只看文字也不一定马上会反应过来。

4.2 汉语方言词序的掌握。有人认为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蜀人左言”是蜀方言的特殊现象，如“公鸡”叫“鸡公”，“白盐”叫“盐巴”，“母王”叫

“王母”，“热闹”叫“闹热”。方言词序与普通话不同，不限于四川方言。林华东提出泉州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构词方式属于正常现象，是上古汉语在泉州方言中的遗存。<sup>18</sup>在客家方言中，有“鸡公”“鸡嫲”“鸭公”“鸭嫲”，<sup>19</sup>日本学者远藤光晓甚至还绘制了“鸡公”和“公鸡”在汉语方言中的地理分布图，罗自群有《从汉语方言“鸡公”“公鸡”看动物名词雌雄南北异序的成因》，认为“鸡公”是汉语固有的，不是南方少数民族语的底层；而“公鸡”是汉语在阿尔泰语影响下由“形容词素修饰语+中心语”这一构词方式后来产生的。对“鸡公”型的看法分大致两种：一种观点是岑麒祥、桥本万太郎等认为是“中心语+修饰语”，称之为“正偏式”；一种观点是张洪年、项梦冰、麦耘、丁邦新等，认为是“修饰语+中心语”，称之为“偏正式”，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认为“鸡公”型的“公”是名词性的。<sup>20</sup>汪化云的研究表明，武汉方言、大冶方言和黄冈方言都存在大量的文白异序现象。<sup>21</sup>丁邦新《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提及新湘语的长沙话、老湘语的双峰话和洞口黄桥话，粤语中的广州话、阳江话，闽语中的厦门话、福州话以及客家话均存在构词异序。<sup>22</sup>

4.3 方言中还需要掌握多音词和同义词。如四川方言“绵”表示动作慢，既读[mia<sup>21</sup>]，又读 [miæn<sup>21</sup>]。这是多音词；让人走开叫“怕” [p<sup>h</sup>A<sup>51</sup>]，又叫“车” [ts<sup>h</sup>e<sup>55</sup>]等，两个词同义。但车又有“打转”的意思，如“螺丝刀~一转”，属于点同义词。

#### 4.4 方言词形的偏误点及预应策略

4.4.1 构词形式上，名词可以重叠，如“草草”、“纸纸”、“飞飞”、“坎坎”、“坡坡”、“碗碗”、“瓢瓢”、“锅锅”、“铲铲”，第二音节都读轻声。动词也可以重叠，如“抽抽”（抽屉）。

4.4.2 形容词的生动形式有 ABB 式，如“水垮垮”、“空捞捞”、“滑溜溜”、“风浩浩”、“活甩甩”、“脏稀稀”、“胖嘟嘟”、“傻豁豁”、“疯扯扯”、“心欠欠”、“念栋栋”、“神戳戳”、“火瞟瞟”、“瓜西西”；又有 AABB 式，如“伸伸展展”、“麻麻杂杂”、“光光生生”，又有结构不清楚的，如“龙二里扯火”。对普通话的 ABB 式形容词，早在 1983 年，艾洪玉就进行了研究。指出他的意义由词根决定，叠音词部分不能单独成词，区别意义关键在于词缀。并研究了词根与词缀的关系。<sup>23</sup>四川方言则杨绍林做了研究<sup>24</sup>。

4.4.3 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另外一种情况是在词根前一个语素，如梆重，捞轻，飞[fei<sup>55</sup>]辣，焦[tciau<sup>55</sup>]苦，迅白，去[tc<sup>h</sup>y<sup>55</sup>]黑，溜酸，昂[ŋaŋ<sup>55</sup>]苦，抵[miŋ<sup>55</sup>]甜。等等。有些则是在词根后另外加上一个叠音词，瓜（惨）稀稀、热（温）撺撺、冰（心）欠欠等。

4.5 方言词缀。在一些方言中，有完全不同于普通话的词缀。这种丰富的词缀，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四川话中的形容词就存在着这样丰富的词缀。

（1）前缀和后缀：前缀如“瓜”，可以在后边加上任意的名词如“～娃子”，“～女子”，“～婆娘”；后缀如“绰绰”，组词如“神～～”，（精神病），“哈～～”（傻），“短～～”（矮）。

（2）“子”缀：倒拐子（肘）、讨口子、叫花子、咕撸子、掂珠子、灶鸡子、切妈子麻拐子、照鸡子。

（3）“儿”缀：克西妹儿（膝盖）、螺丝拐儿（踝）、麻拐儿、打鱼拐儿、看笑神儿。

4.6 构词形式。四川方言多与普通话一致，但有一些绝缘无佐证、本字无可考的例外。

动宾：展劲、架势、各彘、打捶、背时、舍物、砍脑壳、剪脑壳、扯拐、打理扯、经事、下烂药、洗脑壳、爪梦脚、愠气、冲气、行[xaŋ<sup>21</sup>]

事、嗯[ŋən<sup>51</sup>]脚、豁人、冒杂音、打拥堂、带把子、扯把子、梭边边、鬼画桃符。

动补：松活、阴到、默到、迁烦、扯拐、日白、日怪、戳脱、热活[ [xo<sup>55</sup>]、  
簌得很、耳（甩）得远、闹麻了、告（试）一下。

偏正：溪头、曲蟮、黄帮、偷油婆、癞草宝、络到闹、夹肢[tcia<sup>21</sup>]窝。

并列式：喳哇、踏削、干精火旺、流汤滴水、日白廖谎、怪眉怪眼、簌眉  
日眼、饿痨饿呷、东儿当儿、牙尖舌[si<sup>21</sup>]怪、旗鼓铃铛磬。

其它：相因、耳视（理睬）、耳屎（打脸）、左还、、撑头兵帮、灰吧拢耸，  
长次[ts'iau<sup>55</sup>]莫杆。

## 5.0 汉语方言语法的偏误及预应策略

5.1 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英汉语法有较大不同，汉语是意合语言，没有词形变化，不受形式的约束。而英语是形合语言，有词形变化，注重句子形式，有着严格的句法结构。汉语有丰富的量词，这是英语所没有的，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之一。方言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如四川方言有特殊的量词“道”，“喊了一道又一道”，“跑了三道”，这个意义有时可以用量词“转”代替，等等。

5.2 以四川方言为例，与普通话对比，偏误产生显著的不同是在补语的构成上。

5.2.1 能直接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作程度补语（后带“了”）的词相当丰富，且富于表现力。例如：很：累很了/胖很了/看书看很了。惨：喜欢惨了/安逸惨了/热惨了/方惨了/好惨了/坏惨了。完：对完了/好完了/体面完了/精灵完了。

5.2.2、动词后用“倒”、“起”、“倒起”作补语，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着”或用“到”、“了”、“起来”等作补语。<sup>25</sup>例如：看倒看倒就睡着了。（着）到处都买得倒这起布。（到）管不倒那么多。（了）坐起说不如站起干。（着）你坐倒起说嘛。（下）你等倒起，我一哈儿就来。（着）

5.2.3、某些动词后加“得”表示可以、可能、应该做某事，普通话往往用“能（可以、应该+动词）”表示。例如：这起菌子吃得。（可以）这个小娃儿刚满一岁，就走得了。（能）十二点了，睡得。（应该）

5.24 四川话与普通话对比，在句法方面，另一个显着的不同是语气词。例如：①“得嘛”[te<sup>21</sup>ma<sup>21</sup>]，用在陈述句末，表示客观情况。“我们是一家人～。”/“他走了～。”又可单用，表疑问：“吃了饭没～”（得），表示祈使语气：“你走快点～”（嘛）。②哆[to<sup>21</sup>]用在祈使句末或某些陈述句末，表祈使语气或委婉语气。例如：让我再看一眼哆。③“哈”[xa<sup>51</sup>]，表示提醒：“就这样～。”④“嗦”[so<sup>21</sup>]，表示疑问语气：“有这们做事的～？”

## 6.0 汉语方言的语用偏误及预应策略

语用偏误包括语言偏误和语际偏误两类<sup>36</sup>。语言偏误指语言学习中对词的理解不符合相关语言使用者的用语习惯；语际偏误则指在一定的语境中不同的语言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理解有所不同甚至正好相反。例如一种语言中的褒义词、中性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是贬义词。词义相同而褒贬不同，反应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例如，汉语中的“狗”的比喻义通常是贬义，很多用“狗”的词都是表示贬义的，甚至是骂人的话，例如“走狗”、“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狗头军师”、“狗仗人势”，等等。英语中的对应词 dog 的比喻义有很多是褒义或中性，例如：a jolly dog(快活人，有趣的伙伴儿)，Every dog has his day(人总有得意的时候)，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鸟)，有时甚至称自己可爱的孩子为 my dog。

四川话中，有不少的词语不能从语素的组合来考察其实的意义。如：“半截子么爸”是指十三四岁的比较调皮的少年，没有“长辈”的意思。“不认黄”就是“不给面子”，要撕破脸皮，没有颜色的意思。“白脸”就是调皮的意思，还有指小孩子淘气，不听话，但程度较轻，也指大人在说正事而小年青的却去故意干扰，也与辨色无关。又如四川话说谎叫“扯把子”，土匪叫“棒老二”，吹牛

叫“冒皮皮”，说话办事不牢靠叫“吊甩甩”，做事放水叫“放爬子”，企图谋混过关叫“麻广广”，谐趣或想法天真叫“宝气”，办事糊涂叫“雷活泥汤”；“袍”，意思是慌乱。如“搞～了”、“忙～了”。莽[man<sup>55</sup>]的意义是“傻、憨、身材粗壮”等。“拐”是指某件事发生了错误，如“整～了”。再如四川方言中的“不存在”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示多种含义<sup>27</sup>。

## 7.0 对外汉语方言教学纠误的原则与要求

7.1 以语音词汇的纠偏为主要对象。由于教师和语境的双重原因，对外汉语教学的方言大量偏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探寻方言偏误的纠正策略问题。而就对外汉语方言教学来看，由于普通话与方言的差异主要在语音和词汇上，“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变化不大……”<sup>28</sup>赵元任(1968)说：“中国各地方言在文法上最有统一性，除去一些小的分歧，像吴语粤语的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主之前……再除去一些词尾跟语助词的不同……咱们可以说，中国话其实只有一个文法。即使把文言也算在内只在单音节词多，复词少；还有表示地方、来源的的介词组可以放在主要动词之后，而不放在前面。除此以外，实质上，其文法结构不仅跟北京话一致，跟任何方言都一致。”<sup>29</sup>正因为这样，对外汉语方言教学中应该特别重视预防语音和词汇析偏误。赵元任在《吴语对比的若干方面》一文中又说：“汉语方言的差别主要在语音，其次在词汇，语法的差别最小。”<sup>30</sup>

7.2 了解汉语的发展历史。多数对外汉语教师，对于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文字、词汇，虽然知其然，但难以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他们除了解汉语的现状外，还应该了解汉语的历史。对于最主要的方言现象，熟悉其成因。并满足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好奇心，以便更好地掌握一门汉语。换言之，即是将大三角（古方普）

理论<sup>31</sup>，即“以方证普、以古证今”贯穿于教学过程。例如，四川部分方言声母最主要的现象是舌尖音不分前后。暂：北京音念“zhàn”，以前出版的字典也采用这个音<sup>32</sup>。但是这个读音与大部分北方话区域的读音有出入。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把它的读音定为“zàn”，固然考虑到它的通行范围，同时也是根据它的历史状况，《广韵》藏滥切，从母。而精清从心邪组的字，从中古到现代一分为二，一部分细音字与见溪群晓匣的细音字合流读J组，另一部分洪音字和庄组的少部分例外字读Z组。而舌尖后音来源来自于中古的知、庄、章三组，因而“暂”不应该读舌尖后音应读舌尖前音。又如“阶”字在古代的声母是舌根音[k]，汉语普通话中已变为舌面音j[tɕ]了，四川方言仍然念舌根音[k]；。

7.3 注意总结一些汉语方言发展的基本规律。例如，四川方言一些地区保存着古入声，而古入声的辨识有一些特定的规律。可以将这些规律教给学生。如从汉语拼音出发对古入声字的辨识：

- ①所有阳声韵（即以-m-n-ŋ 结尾的韵）的字不是入声字。
- ②声母是“d、b、g、z、j、zh”的阳平字是古入声字。
- ③“ue”韵母的字大都来自古入声。
- ④“uo”与“zh、ch、sh”相拼是古入声。
- ⑤“e”与端、精组相拼是古入声字。
- ⑥“ie”和帮、端组相拼是古入声。
- ⑦“f、z、c、s”和“a”相拼是古入声字

可将这些规律与方言的对应关系讲清楚，就可迅速地掌握方言。又如现代汉语中与中古汉语相较，全浊声母清化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中古汉语的声母共有三十七个，其中并(奉)、定、澄、从、邪、崇、俟、船、禅、群、匣十一母为全浊音，这些全浊音到了《中原音韵》时代全部变成了清音声母。变化的主要条件是声母的清浊（如并母）和洪细（如从母）。



7.4 注意方言区的特殊现象。例如，中古的平声调，现代汉语分化成两个调，即阴平和阳平。这种分化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凡中古的清声母平声字，现代多读阴平，即第一声，比如“公”中古声母是[k]，现代读[kuŋ<sup>55</sup>]，“多”中古声母是[d]，现代读[tuo<sup>55</sup>]，凡中古次浊声母（指[m]、[n]、[ŋ]、[l]等声母）和全浊声母平声字，现代读阳平，即第二声，比如“明”中古声母是[m]，现代读[miŋ<sup>21</sup>]，“驼”中古声母是[d]，现代读[t<sup>h</sup>uo<sup>21</sup>]，但四川方言的上声和去声调值有所不同。这又是需要掌握的<sup>33</sup>。

7.5 教师要注意进行汉语方音调查。赵元任在1928年完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专著，他根据中古音研究成果制定的方言调查表至今仍然是调查方言语音系统所用表格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为语音研究积累了大批方言语音资料，大大加深了对汉语语音特性的认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工具和资料，对本地方言进行调查，使其学习者能更好地在学习后与当地的语言环境融合。

7.6 具备对形声字表音功能的正确认识。经过两汉，汉字的谐声关系已经打乱。段玉裁提出的“同谐声必同部”的原则，魏晋宋时期在韵部归字中已经不起作用。如从“台”得声的“哈台怠胎苔诒怡始”等字上古属于之部，到了魏朝，“台怠胎苔”等开口一等字归入咍部，“诒怡始”等开口三等字仍在之部。从“今”得声的“琴岑阴吟含贪黔钤念颀”等字上古属于侵部，到了晋朝，开口三等字“黔钤（盐韵）”和开口四等“念（添韵去声）”归入盐部，其它字仍然留在侵部，到了刘宋，“含贪”等一等字（覃韵）也变成覃部字，只有三等字“琴岑阴吟”等仍然留在侵部。从声母看，如以“且”为声符的字，基本上都读[tʂu]，如：租、诅、阻、组、俎、祖，但是只有一个“助”字例外，读[tʂu]。再如以“宗”为声符的字，基本上都读以舌尖前音，如：综、棕、踪、踪、鬃、粽，但是只有一个“崇”字例外。有的时候，声旁不表音，还表现在含旁字有几种读音。如以“兑”[tuei<sup>51</sup>]为声符的字：有悦阅[ye4；税[ʂ<sup>h</sup>uei<sup>51</sup>]；锐[[zuei<sup>51</sup>]；蜕[t<sup>h</sup>tui<sup>51</sup>]

脱[t<sup>h</sup>uo<sup>55</sup>]),等等。

**7.7** 对外汉语方言教学中要注意与文化、民俗的了解相结合。现代汉语用‘肚子大了’,身体不方便了”、“有了”专指“坏有了小孩了”,“同房”专指“夫妻过性生活”,‘发生关系’专指‘发生性关系”,“第三者”专指“插足于他人家庭,跟夫妇中的一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人”。这种含蓄委婉而显得模糊的。女性对男性说“你真坏”,结果却表达“好”或“很有男人味”的意思。再如说某人“他有病”,并不是真有病,而是他的思想不合时宜,想法奇特的意思。四川方言中有一个说法“唱拗角船”,从字面上理解无论如何都难以讲得通。这个词指“不配合”、“不合作”的意思,往往用于一家人、一个班子的不团结的情况。既没有“船”,且船也不能“唱”,必须与一定的文化氛围联结起来才能理解其含义。

## 8.0 小结

学习汉语,既要学习普通话,也要学习方言。学习普通话是学习方言的基础,学习方言是学习普通话、更好地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必然归宿。如果说学习普通话的偏误多为事后的纠错,学习方言的产生的偏误则需要更多地预应理论上。建立预应理论的前提是对汉语的历史、汉语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形式、汉语的语际三方言进行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过“普通话~方言”对应关系,找出规律与特色。末了,还应该指出,没有学好普通话的学生要防止“普~方”对应中的负迁移,否则学生既没有学好普通话,也学不好方言。

注解:

<sup>1</sup> 赵春利,〈对外汉语偏误分析二十年研究回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 鲁国尧(2003,10).《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页8。

3 赵元任(1980,6).《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页101。

4 胡适(1998,11).〈吴歌甲集·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八(北京大学出版社),页574。

5 沈兼士(1996,12).《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序》(中华书局),页11。

- 6 《切韵》的性质有单一音和综合音说之分，约略有四说：(1) 长安音说。瑞典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1889 - 1978)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中国古代音韵论集》，又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译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台湾周发高，〈从玄应音义考察唐初的语音〉，《中国语文论丛》 (台北正中书局 1953 年)，主此说。(2) 洛阳音说。李荣，《切韵音系》 (科学出版社，1956 年)。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邵荣芬，《切韵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3) 金陵和邳下文人音。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 (中华书局，1966 年)。(4) 金陵雅言说。见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又《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黄山书社，1987 年) 版等。
- 7 王文虎 (1987. 7). 〈地方性因素与乡土教材〉，《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编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页 122。
- 8 Corder, P.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9 鲁健骥，〈偏误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2 年第 1 期。
- 10 赵春利，〈对外汉语偏误分析二十年研究回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 11 季秀清、宋希仲，〈谈谈错误分析与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邓崇莫主编，《对外汉语教学》第 1 期，北京语言学院 1983 年 12 月油印本，页 107。
- 12 “迁移” (transfer) 是外语习得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指的是学习者在用目的语进行交际时，试图借助于母语的语音、词义、结构规则或文化习惯来表达思想这样一种现象。在外语学习的初级阶段最为明显在外语学习的初级阶段最为明显。语言迁移一般有两种：即正迁移 (positive transfer) 和负迁移 (negative transfer)。
- 13 齐沪扬 (2005, 9).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页 364。
- 14 例如苏州话有 26 个声母 (不包括零声母，下同)，45 个韵母，7 个声调；福州话有 15 个声母，43 个韵母，7 个声调；广州话有 20 个声母，53 个韵母，9 个声调；南昌话有 19 个声母，65 个韵母，6 个声调；烟台话有 21 个声母，37 个韵母，3 个声调。
- 15 崔荣昌 (1996, 8). 《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页 119-123。
- 16 例如，滦县、烟台就只有三个声调。而即便是其他四个声调的地区，古入声字也归入不同的声调。如沈阳、济南入声归阴、阳、去三声，烟台、滦县入平上去三声。同是吴方言区，苏州 7 个声调，无锡 8 个声调，而上海是 5 个声调。方言最多的声调可以多到 10 个。
- 17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草驴女猫”条。
- 18 林华东，〈从复合词的“异序”论汉语的类型学特征〉，《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 19 袁家骅表面上看 (1960, 2). 《汉语方言概要》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页 171。
- 20 罗自群，〈从汉语方言“鸡公”“公鸡”看动物名词雌雄南北异序的成因〉，《方言》，2006 年第 4 期。
- 21 汪化云，〈黄冈方言文白异序现象初探〉，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3 分。
- 22 丁邦新，〈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方言》，2000 年第 3

期。

- 23 艾洪玉,〈谈 ABB 式形容词〉, 邓崇莫主编,《对外汉语教学》第 1 期, 北京语言学院 1983 年 12 月油印本, 页 113。
- 24 杨绍林,〈成都方言 ABB 式形容词的特点〉,《方言》, 1995 年第 1 期。
- 25 田懋勤,〈四川话的“倒”和“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1983 年第 4 期。又李苑〈都话的“倒”和“起”〉,《现代语文》, 2008 年第 2 期。
- 26 吕文华(1994, 1).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北京: 语文出版社), 页 310。
- 27 王南冰,〈四川方言中“不存在”的语用意义〉,《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1 期。
- 28 汪启明(1998).《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成都: 巴蜀书社), 页 82。
- 29 赵元任(1980).《中国话的文法》, 丁邦新译(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页 8。
- 30 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 叶蜚声译(1985)(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 61。
- 31 邢福义(1993, 1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邢福义自选集》(郑州: 大象出版社), 页 294。
- 32《新华字典》(1953).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页 427。
- 33<sup>1</sup> 崔荣昌(1996).《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页 123。

## 【参考文献】

- 崔荣昌(1996).《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梁德曼(1982).《四川方言与普通话》(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黄尚军(2002).《四川方言与民俗》(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张清源、张清源、邓英树(2001).《成都方言语法研究》(成都: 巴蜀书社)。
- 周家筠,〈成都话的“得”〉,《四川大学学报》, 1983 年第 1 期。
- 张一舟,〈川话口语几个常用虚词的用法〉,《四川大学学报》, 1983 年第 1 期。
- 田懋勤,〈川话的“倒”和“起”〉,《西南民族学院》, 1983 年第 4 期。
- 郝锡炯,〈古入声的演变谈根据四川方言辨认古入声字〉,《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1980 年第 3 期。
- 张清源,〈都话的动态助词“倒”和“起”〉,《中国语言学报》, 1991 年第 4 期。
- 喻遂生,〈重庆话的附缀形容词〉,《语言学论丛》(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9 辑。
- 赵春利,〈对外汉语偏误分析二十年研究回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2 期。